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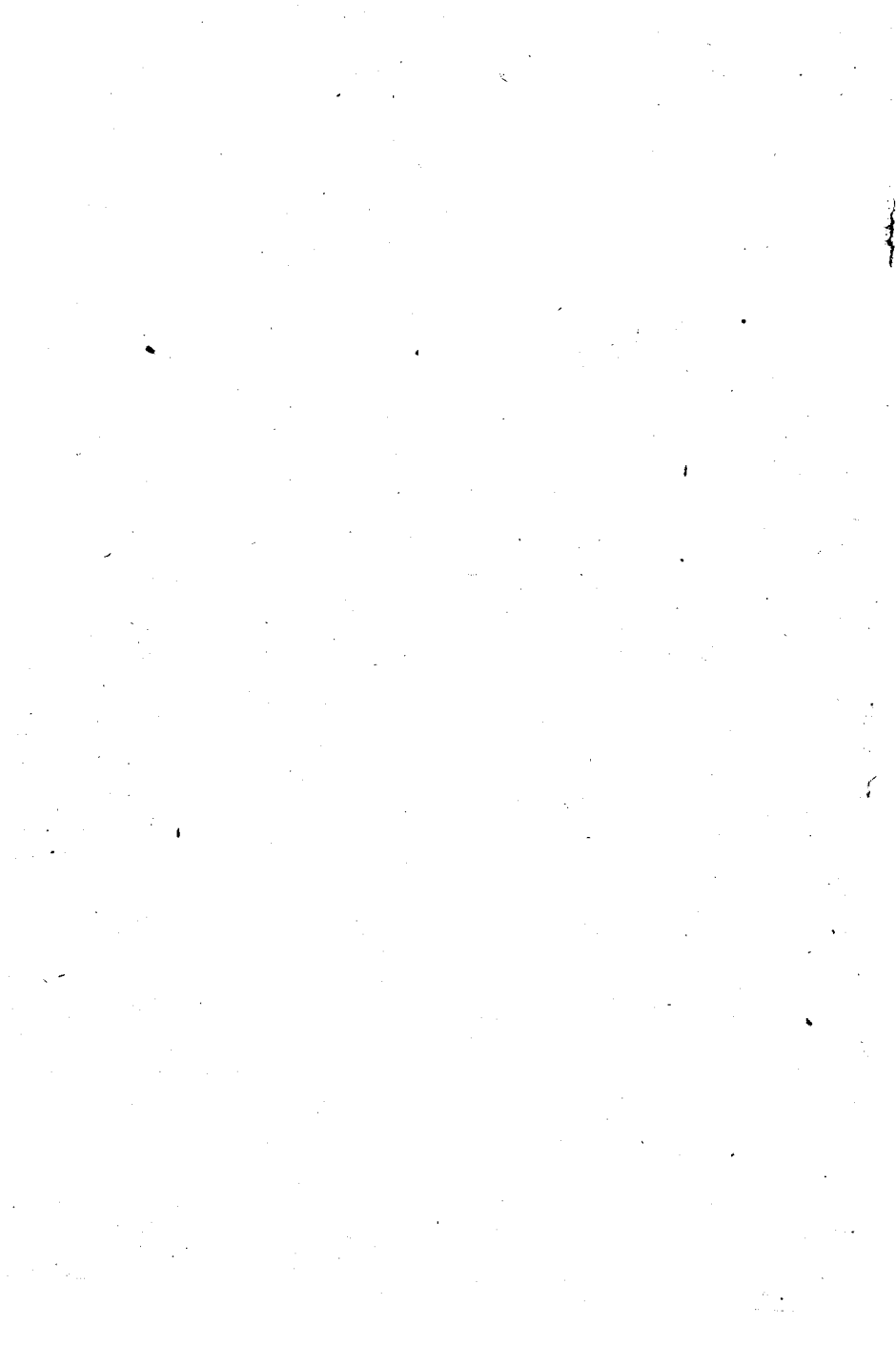
目 录

党的創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3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统一战线中爭夺领导权的斗争·····	38
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66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	83
党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	125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斗争·····	144

党的創立和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4 (平)
16 F2
M(-) p2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它的产生，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的结果。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从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逐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一八四〇年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种种侵略手段，大举向中国入侵。它们特别是使用野蛮的侵略战争手段，强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索取了大量的赔款，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它们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例如在中国强占租界、驻扎军队、协定关税、领事裁判、内河航运、设厂、开矿、筑路等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残暴的统治。它们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量倾销商品。并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设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财政，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它们不仅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使中国虽然还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已丧失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把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促使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

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着显著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势力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中国社会虽然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但是也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逐步地变成了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竭力扶植封建统治阶级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则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并把帝国主义作为维持它的反动统治的靠山。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结成反动同盟，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之下，中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工人、农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进行了八十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斗争，虽然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是最后都

失败了。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且人数最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提不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并曾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如辛亥革命中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但是由于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勇气，并害怕群众，因此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八页）因此，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创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的基础。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伴随着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向中国倾销

商品，掠夺原料，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一些沿海城市陆续开办了一些交通运输企业，如船塢、航运公司等，这些企业雇佣了大量中国工人，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一些沿海城市的租界地内，又兴办了一些市政企业，如自来水公司和电车公司等，也雇佣了一批中国工人。特别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开办的工矿企业急剧增加，到一九一三年已达一三〇多家。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利用英法德等国无暇东顾的机会，乘机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中国大量开办厂矿企业，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日本在华设立的较大的厂矿就有二百二十二家。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加紧其对华的经济扩张，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在远东的霸权。因而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工人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起来。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的封建官僚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如安庆军械所、上海制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等等。以后封建官僚又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办了一些采矿、炼铁、机器制造和纺织等近代工业；由此又产生了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中做工的产业工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向新式工业投资，主要是开办了一些轻工业企业，如缫丝、纺织、火柴、制茶、碾米、造纸等，这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些企业的规模不大，而且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得不到自由发展，但也雇佣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到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相对地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一些轻工业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从一九

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在轻工业的二十三个行业中，新设工厂有六百七十五家，其中纺织工业占二百四十四家。其他如面粉、卷烟、火柴等，也有迅速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的统计，一九一四年全国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额为六千二百多万元，一九二〇年增至一亿五千五百多万元，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发展壮大起来。在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过一百多万人，到一九一九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〇页）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出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种压迫，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他们劳动时间长，工资低，没有劳动保护，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所受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特别集中。中国工人不仅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少数大城市，而且集中在铁路、矿山、航运、造船、纺织等少数行业的大企业中，这样就有利于无产阶级团结战斗，能够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发挥强大无比的威力。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出身于破产农民的占多数，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领导农民

进行革命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早在一八五八年，中国工人阶级就在香港举行过两万多人的罢工，反对英法侵略军强占广州城。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矿六千多工人响应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当时报刊统计，从一八七九年到一九一三年三十多年间，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共达七十八次之多。一九一六年以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一九一六年罢工十七次，一九一七年增加到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增加到三十次，一九一九年仅一月到五月就发生了三十一一次罢工。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还是自发性的斗争。因为，那时的工人运动还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工人阶级还不能认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还不能认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因此还提不出本阶级的政治要求和斗争纲领，而只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尽管如此，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已经显示出坚强的革命精神，并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物质的基础。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的影响，而思想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在中国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同时，从一九一五年起，在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中，一场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形成为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

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

清朝的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继之而起的仍然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袁世凯在窃取了共和国的权力之后，很快就破坏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加强其个人的专制独裁，直至演出恢复帝制的丑剧。为了给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文化思想上极力鼓吹尊孔复古，提倡蒙昧主义。在经济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对外则推行卖国外交，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特别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改制称帝的支持，袁世凯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发展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出路在那里？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复古主义的盛行，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痛感到：这场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缺乏一个彻底的思想革命。因此，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是创刊于一九一五年九月的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是这个刊物的创办人。陈独秀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强调了中国需要改弦更张。他认为中国的旧有文化和社会制度，从伦理、法律到礼俗，都是封建制度所遗留的，与欧洲人相比，其差距“几及千载”。他大声急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他明确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要人们打破封建迷信和专制主义。随后，他在相继发表的

许多文章中，进一步批判了“三纲五常”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指出它同建立以西洋社会为楷模的共和制根本不能相容，号召青年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便能够“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新青年》用以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迷信观念的武器，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倡的“民主与科学”，陈独秀称之为人权与科学。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作了这样的阐述：

“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关于科学，陈独秀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新青年》高举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于打破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开辟“五四”一代新风具有重大深刻的影响，《新青年》于是一时成为国内忧患民族危亡、渴求救国真理的进步青年的灯塔，而陈独秀也就成为思想界很有影响的人物。

这场新文化运动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十九世纪末已经有过的“新学”与“旧学”斗争的继续，但是它又远比过去彻底，这个彻底性表现在它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两千年封建思想集中的代表——孔子及其道德观念，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过去“新学”派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所不曾触动也不敢触动的“禁区”。过去的一些“新学”派人物到了这时竟成了维护封建思想的代表，康有为就是一个典型，他当时曾电请北洋军阀政府拜孔尊教，“以孔子为

大教，编入宪法”。尊孔读经的逆流，进一步激起了新文化倡导者们猛烈的冲击，陈独秀写了好几篇文章予以驳斥，甚至提出这样激烈的主张：“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著名四川学者吴虞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等文章，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流毒天下，“不减洪水猛兽”。这样把孔子的伦理学说和政治上的专制制度、社会组织上的家族制度联系起来加以抨击，从而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实质。伟大的鲁迅在他著名的《狂人日记》小说中，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是对封建礼教一针见血的深刻揭露。小说最后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思想的变革必然要在文学领域中有所表现，引起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变革。正是在深入批判封建道德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又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向封建文学和八股文发动了进攻。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的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提出了改革中国旧文学体裁的建议。但它仅限于文体的改革，主要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不触及旧文学的思想内容。陈独秀就此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把文学革命明确地同反孔的思想革命联系起来，发出了文学革命的号召，要求从根本上抛弃封建主义、形式主义的旧文学，建设民主主义的、新鲜的、写实的社会文学平民文学。这个号召引起了思想界更加广泛的震动，将新文化运动迅速引向了高潮。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则把文学革命的

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最好地结合起来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这个文学革命中诞生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对封建主义的各方面的攻击，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作为学习的榜样，但是处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证实着共和制度的破产，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促使着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人对共和制度的怀疑不断地增涨起来。早期的李大钊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从拥护共和制到进一步怀疑共和制的爱国的先进分子，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痛感国家的危亡，站到了反封建斗争的前列。他那“慷慨思投笔”写下的《隐忧篇》、《大哀篇》和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气势磅礴的论文，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和对未来前途的信心。一九一六年他发表的《青春》一文，号召青年们自觉起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把古老的旧中国变成“青春的中国”。高度的民族责任感驱使他深入的观察中国的现状和世界的趋向，从而自然地产生对共和制度的怀疑，“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于是，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一面同封建主义斗争，一面进行着更新的探索。这就是他当时虽然总的思想还没有超出民主主义范畴，但后来却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李大钊同志的道路也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一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道路。

在新文化运动向着高潮发展的时候，一九一七年一月，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提出的办学方针是“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允许资产阶级与封建文化同时合法存在、自由发展；并且聘请了一些倡

导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如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李大钊同志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由于北京大学集中了一批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士，加上在“兼容并包”的方针下，新旧文化思想有一个比较能够自由争辩的场所，这样，五四前夕的北大遂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就其性质说还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有其一定的历史的局限和缺点，它对中国历史文化所采取的方法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这个运动也没有能够同实际的政治运动充分结合起来；但是，它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桎梏，提倡民主与科学，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伟大的启蒙作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也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新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文化生力军进一步壮大的结果。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革命以巨大的鼓舞，促进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从而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世界革命浪潮滚滚。“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选集》第二

卷，第六六〇页）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给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中国思想界以极大的震动，一部分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最早热情歌颂了这个伟大的胜利。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深刻地指出了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他断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着重地指出革命群众运动的巨大无比的威力，十月革命的新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是可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最后，他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同志的文章代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局势的看法，表达了中国人民应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前进的愿望。通过李大钊同志以及在他影响之下的其他先进分子的宣传介绍和积极活动，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的影响不断扩大，有力地激励着苦难的中国人民进行新的斗争，呼唤着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山东问题的外交大失败。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霸占我国山东主权，早就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和对军阀政府的不满。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巴黎和会，竟然不顾中国人民维护主权的正当要求，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得的山东权益，在和约条文中明文规定下来。这样，中国虽然以“战胜国”名义参加了

“和会”，但不仅没有从“和会”收回任何权利，反而受了一次莫大的愚弄，套上更加沉重的枷锁，这就使得许多人包括一些原来对和会抱有幻想的人，都从失望中开始觉醒过来，蕴藏在人民中的爱国怒火就如火山一般立即爆发了。

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十三个大中学校三千多人集会于天安门前。学生手持“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标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当时的交通总长）、陆宗輿（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驻日公使）等三人。会议冲破了军警的阻挠，通过了《宣言》，并且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游行。

游行的群众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外国使馆区时，遭到了帝国主义巡捕和反动军警的拦阻，人们感到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人都不能自由地行走时，情绪更加激昂，于是游行队伍便直奔东单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处。这时曹汝霖已经闻讯逃走，爱国的青年激于义愤，冲进了曹家住宅，痛打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且将曹宅放火烧起来。虽然曹宅的火被反动军警扑灭了，但是北京学生燃起的爱国的火焰，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燃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五月七日，天津学生举行了示威，同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接着，五月十九日北京学生进一步举行了罢课，上海学生为响应北京也于五月二十六日举行罢课，武汉、长沙等城市学生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学生除示威、罢课以外，还进行街头演讲、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对于爱国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动军阀采取了高压手段，疯狂进行镇压。但是爱国青年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坚持斗争，数十万学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的前头，成为这次运动的

一个重大特点。但是单有学生的孤军奋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当着“六·三”以后，全国以工人为主力的各阶层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时，运动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六月三日，北京军阀政府对学生进行大逮捕，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六月五日，上海工人首先起来支援学生。五日上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三、四、五厂五千多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一起罢工，下午，浦东日华纱厂和杨树浦上海纱厂工人都继起参加，罢工迅速扩大到全市。六日、七日、八日，上海的邮电工人、船塢工人、清洁工人也都纷纷举行罢工；六月九日、十日，海员和铁路工人分别投入了战斗，斗争进入了高潮，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包括店员工人在内在六、七万人以上。在工人阶级的坚决要求和直接推动下，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举行了罢市，于是实现了工人、学生、民族资本家联合的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

上海工人这次斗争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表现了鲜明的独立政治倾向。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斗争扩大，打出“文明抵制”的旗号，劝告工人“幸勿暴动”的时候，工人则声言自己的斗争，不仅是为声援学生，而且是要“格政府之心，杀灭亡之祸”。从始到终，工人们表现了团结战斗的精神，坚持到底的斗争决心。日华纱厂的工人打破了日本资本家分裂男女工人的阴谋，英、美企业工人以自己的一致行动对付资本家的威胁利诱，表明了鲜明的反帝立场。店员工人挂出了“不除国贼不开市”的字条，当中国资本家酝酿开市的消息传出之后，工人们表示：“即令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这样在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下，上海的工业生产瘫痪了，对外水陆交通断绝了，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他们惊呼：这是“第一次动摇上海工业机构的罢